

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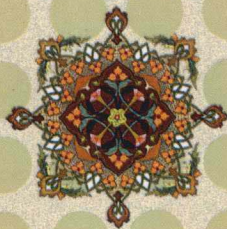
兰州大学民族学精选文库

LANZHOU DAXUE MINZUXUE JINGXUANWENKU

土族文化传承与变迁 ——以辛家庄和贺尔郡为例的研究

TUZU WENHUA CHUANCHENG YU BIANQIAN
—YI XINJIAZHUANG HE HEERJUN WEILIDEYANJIU

裴丽丽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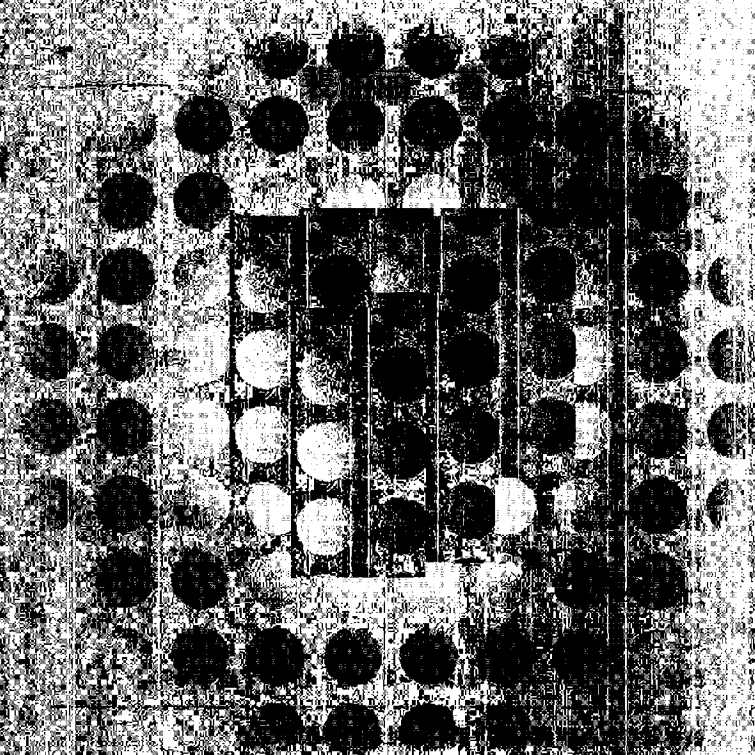


民族出版社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土族文化传承与变迁——以辛家庄和贺尔郡为例的研究/裴丽丽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0. 11

(兰州大学民族学精选文库)

ISBN 978 - 7 - 105 - 11214 - 2

I. ①土… II. ①裴… III. ①土族—民族文化—研究—民和县—1949 ~ IV. ①K283.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9203 号

策划编辑: 杨 青

责任编辑: 欧 泽

封面设计: 汉风斋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cbs.com>

印 刷: 北京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数: 225 千字

印 张: 13

定 价: 32.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1214 - 2 / K · 1960 (汉 1089)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 010 -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11734

序

杨建新

兰州大学走过了一百年的峥嵘岁月。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成立也快十年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出版这套文库，献给哺育我们成长、关心我们工作的兰州大学和兰州大学的全体师生。

民族学在兰州大学只有十多年的历史，与许多兄弟学科相比，他只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因此他曾被忽略过、轻视过，不过这个有极强活力的生命，终于还是在兰州大学这块沃土上坚强的成长起来，为自己争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至今，兰州大学的民族学已经是博士学科一级授权点，拥有五个二级博士点，同时是国家重点学科。作为民族学科的载体，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也成长壮大，成为在国内小有名气的科学研究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新的研究型实体。

不到十年的岁月里，在中心的老师们辛勤耕耘下，仅由中心老师及他（她）们指导下写出的民族学专著就达八十多部。现在摆在您面前精选出的这套文库，就是这些年来，中心师生用知识、智慧和汗水辛勤浇灌出的部分成果。当然，“精选”者，仅指从上述八十多部专著中精心选出者之谓，并非一定是精品。但是我们有信心，经过我们的扎实工作和潜心研究，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精品问世。

借本文库出版之际，还想就当前我国民族学的发展，说一些心得和体会。

民族学（Ethnology）在20世纪初传入我国学术界时，初译为“人类学”、“民种学”。至20世纪20年代，蔡元培先生始将其译为“民族学”。这一译称虽不完全符合希腊文的原意，也没有紧扣该学科在西方的主要研究对象，但“民族学”这一译称，却十分符合中国的实际。

中国古代虽无“民族”一词，但中国古代用于表达民族共同体的“族”一词的含义，已具有“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和轮廓。中国古代的“族”，种类繁多，形态多样，发育充分，作为人们的共同体，拥有鲜明的诸多共同因素。而且“民族学”作为一种学科传入中国之时，正是中国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十分突出的时期，民族问题已成为涉及国家社会稳定、领土完整的大事。民族问题，从清末以来就与社会稳定、边疆安全、抗击外国入侵问题完全结合在了一起。因此这一译名一出现，立即成为中国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名称。

至今，我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仍有密切关系，而且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民族学就是西方的文化人类学，但是，实际上由于中国的民族和民族问题与一些发达国家的“民族”、民族问题和“族群”有很大的区别，因此中国民族学在研究中已经凝练出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主导思想，也就是说，中国学术界，在运用从西方传来的“民族学”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密切与中国的民族实际相结合，逐步创建和成长出了中国化的民族学。民族学在中国流行百年的历史，就是民族学中国化的过程。

民族学这门学问在中国，其基本学术概念就是“民族”，他就是研究民族这种共同体及其发展的一个学科，不研究民族，他在众多的学科中就没有地位，也就失去了他存在的价值。他的基本任务，是研究和揭示民族的产生、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规律，他是一门科学；民族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民族这种特殊人们共同体构成的诸要素，揭示这些要素在民族共同体中的发展、变化、作用、相互联系及其运行机制；民族学当然还要研究和揭示每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质及其具体发展规律。中国的民族并非仅仅是文化群体，而是一个与政治密切相连，关系到社会、经济、文化、历史、心理及种族、生物等诸多因素的群体，研究他必然涉及众多的学科，因此民族学又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很强的学科。

民族学在中国学术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中国民族学即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就是这个过程的结果。中国民族学与国外民族学，有密切的联系，中国民族学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标、研究传统、研究视角等方面，继承和吸收了大量国外民族学的优良成果，同时，中国民族学又有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主要表现在下列五方面：

1. 在指导思想方面，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放眼中国和世界民族、民族问题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充分反映和吸收世界民族学发展的优秀思想和最新成果，促进中国和世界各民族的平等、和谐发展。

2. 在内容方面，以中国民族学和民族问题为基本内容，构建符合中国和世界民族新发展的知识体系。

3. 在方法方面，采用实证的、思辨的、比较的、综合的多种方法，定性与定量结合，描述与分析综合结合，田野与文献结合，充分使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民族学研究有更加广阔的道路。

4. 在视角方面，认为民族是一个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心理及种族、生物等各种因素的群体，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群体，全方位研究揭示民族的各个方面，是民族学的显著特色。

5. 在思想传统方面，继承中国古代对民族实体、民族关系、民族问题丰富而深邃的思想认识，吸取中国历史上处理和对待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经验、政策和方法，使民族学在具有数千年多民族共处历史以及积累了深厚传统民族思想的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和发展。

具有这样一些特色的中国民族学，既是当前广大中国民族学者的研究实践，也是多年来中国民族学界的主流愿望。

本文库的出版，就反映了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想在推动民族学中国化，创立有中国特色民族学方面做些工作的强烈愿望。

欢迎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2009 年 4 月

目 录

绪 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状况 (2)
- 二、对相关概念的界定和说明 (7)
- 三、史料的运用与个案的选择 (10)

第一章 村落的概况

- 第一节 村落的土地人口与内部格局 (20)
- 第二节 村落的历史溯源与区划沿革 (24)
- 第三节 村落的聚落类型与对外交往 (28)

第二章 土族物质文化的变化

- 第一节 生计方式的转型 (32)
- 第二节 居住交通的变化 (35)
- 第三节 饮食文化的重构 (40)
- 第四节 服饰文化的演变 (43)

第三章 土族语言文字的变化

- 第一节 土族语及文字的基本状况 (46)
- 第二节 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 (52)
- 第三节 姓名习俗与语言文化 (56)

第四章 土族婚姻的变迁

- 第一节 婚姻形态的变迁 (61)
- 第二节 择偶方面的变化 (71)



第三节	婚礼仪式的简化	(75)
第四节	通婚圈的扩展	(79)
第五章	土族家庭的演变	
第一节	家庭观念的演变	(96)
第二节	家庭结构的变化	(98)
第三节	家庭关系的变动	(106)
第六章	土族丧葬的变迁	
第一节	土族的丧葬类型与观念	(112)
第二节	土族的丧葬过程与仪式	(114)
第七章	土族宗教信仰的变迁	
第一节	土族宗教信仰的多元体系	(124)
第二节	土族的宗教行为与观念	(139)
第三节	土族民间团体嘛呢会	(142)
第四节	土族的二郎神信仰	(156)
结 论		(159)
第八章	土族节日习俗与娱乐方式的变迁	
第一节	岁时节日与时间设置	(163)
第二节	纳顿节的狂欢精神	(172)
第三节	流逝的民间游戏	(177)
第九章	结语与前瞻	
第一节	土族文化传承与变迁的特点	(179)
第二节	土族文化传承与变迁的影响因素	(182)
第三节	土族文化未来的发展走向	(186)
附 录		
一、引用与参考文献		(190)
二、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195)
后记		(196)

绪 论

土族是世居我国西北的少数民族之一，是由操蒙古语族语言的众多民族经过长期的融合，大约于元明时期形成的民族，现在以较少的人口和鲜明的民族特色为众多研究者所关注。据 2000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土族共有 241 198 人，其中居住在青海省的有 187 562 人，居住在甘肃省的有 30 338 人，合计 217 900 人，约占土族总人口的 90.34%。土族居住的地区多为崇山峻岭，“茂木深林，蹊径狭隘，有山川之险矣”^①。他们向土地讨生，靠天吃饭，主要以农业维持着世代代的生存和繁衍。乍走进土族的世界可以感到：作为农民，土族和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其他农业民族没有太多差异。他们或粗放经营，或精耕细作，在田间地头奔忙，生产的食粮自给自足；他们的社会交往范围狭隘封闭，许多妇女的活动甚至局限在本村范围之内；他们不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对外来文化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但是在当地其他土著民族的眼中，土族与他们有着难以言明的外观差异，可以凭直觉来判断一个人的民族成分。的确，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群体，土族传承了独有的传统文化，保持了本民族的固有特征而延续至今：他们内部通行一种以蒙古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共同语，日常生活和交流使用的都是土族语；他们在婚丧礼仪中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在宗教仪式中展现着自己的信仰和精神世界。但是，在现代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开疆拓土的时候，即使是居住在西北边陲“桃花源”式村落空间中的土族，其生活方式也有所转变，其文化也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迁。

本书试图论述的是自 20 世纪起尤其是 1949 年之后至今的时段中，

^① 梁汾：《秦边记略》，39 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

土族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和碰撞中,发生的迅猛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兴替。以往中外学者对土族的民俗、宗教、语言等各方面的文化现象已经有不同程度的关注,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从文化传承与变迁的角度作深入细致的描述和系统研究的论文尚不多见。本书围绕有关文化变迁的许多命题建构而成,每个命题都有其鲜明的特色,而贯穿全文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变迁中的土族社区。土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民族?土族人的行为方式遵循着什么样的原则?在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他如何保持了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特色而延续至今,与其他民族的文化相媲美?他的文化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轨迹,有什么特征和倾向,影响其文化传承和变迁的因素有哪些?文化接触和现代文化的传播在土族文化变迁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本书将运用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自己的解释。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状况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关注的焦点在于民族群体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在某种特定政治、经济范围之内的整个文化体系。因而,对文化的关注历来是民族学研究的一个传统。通过对不同民族文化的研究,我们能够了解体现各个民族特质的文化,得以从横向维度比较各种文化之间的异同,进而获得从外部观察我们自身文化的视角和观点。文化变迁也是民族学人类学界的一个传统课题。对文化变迁的研究,使我们得以从纵向的维度对文化有一种辩证的发展的认识。文化变迁研究领域硕果累累: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以及《再访江村》、《三访江村》是描写江苏省吴江市开弦弓村变迁的典型范例;庄孔韶的《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采用杂然相陈的写法对林耀华《金翼》中福建黄村社会文化变迁作出了描述和研究;周晓虹著有《传统与变迁:浙江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从社会心理学的切面分析了当代浙江农民在不同的制度、经济背景之下的心理变迁;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合著的《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以浙北自然村落陈家场作为个案,对该地区20世纪后半期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变迁进行了文化人类学考察;柯克·约翰逊著有《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一书,从崭新的角度描写了印度农村的变迁;谭必友的《古村社会变迁:一个话语群的分析实验》从话语群角度对

湖北一个乡村做了深描；此外，还有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加拿大学者宝森的《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柏贵喜的《转型与发展：当代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滕星的《文化变迁与双语教育》，杨薇的《日本文化模式与社会变迁》，徐平的《羌村社会》，翁乃群主编《南昆八村：南昆铁路建设与沿线村落社会文化变迁》，费孝通翻译、威廉·费尔丁·奥格本著的《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等等。学者们对于文化变迁的研究，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证调查，不仅仅在于忠实记录和描述特定民族的文化发展历程，更重要的在于从中分析和把握民族社会文化发展的主要脉络、特点和趋势，通过实证研究建构文化影响和文化接触的理论范式，为我们认识不同特质的文化提供理论借鉴，从而在更深层意义上寻求一种和变化中的民族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的方式。这些成果，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和分析的框架。

但是以土族文化为对象的研究，却往往偏重于静态的研究，缺少动态的分析。笔者选择土族作为对象来研究其文化变迁情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方面系统研究的缺乏。近代对土族文化的研究，始于19世纪外国学者对土族语的记录和关注。波塔宁的《中国之唐古特边区及中央蒙古》（1893）、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书面语和喀尔喀方言比较语法》（1929）、德斯迈和田清波的《西部甘肃蒙古人所言之蒙古尔方言》（1930）、鲍培的《蒙古语比较研究绪论》（1955）、桑席叶夫的《蒙古语比较语法》（1955）等，主要是从语言学角度对土族语进行的研究。而外国学者对土族文化的研究，当首推比利时的许让神父。他于1915—1920年间在今青海互助地区（当时青海尚未建省，隶属甘肃省）详细考察了土族的婚姻状况，特别是婚姻种类、婚姻过程以及各种婚姻的社会文化背景，并于1932年由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出版了法文版的《甘肃土人的婚姻》。费孝通先生和王同惠女士翻译的中文版本于1993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后来，在美国费城出版了许让神父的《甘—藏边境的土族》（*The Monguours of the Kansu—Tibetan frontier*）三卷本，分别是《土族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1954）、《土族的宗教生活》（1957）、《土族族谱》（1961）。德国学者施劳德曾于20世纪40年代在互助县威远镇向当地老艺人搜集了用土族语讲唱的《土族格赛尔》史诗，首先用德文出版，1994年翻译为中文，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国内学者对土族的研究,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土族族源的关注。抗日战争开始后,出于战略形势需要,国人对西北民族的关注增多,游记成为了解这一时期土族文化的重要史料,如乐天的《青海之土人》、马鹤天的《西北考察记》、孟希元的《互助县土人调查记》、庄学本的《青海旅行记》等。青海建省之后,组织了对青海各地的风土调查,涉及土族的有《民和风土调查记》等。这一时期对土族族源和历史的认识逐渐升温,发表了一系列探讨土族族源的论文。^① 他的文化也逐渐为世人所关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卫惠林先生,他曾于20世纪40年代到土族地区进行考察,并著有《青海“土人”的婚姻与亲族制度》一文。这些研究成果为世人展现了土族文化的特色。

新中国成立之后,通过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1955年,初步确立了土族的民族名称。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陈永龄、宋蜀华等先生和青海少数民族调查组分别于1953年和1958—1959年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以下简称互助县)和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民和县)开展了土族社会、历史调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土族政治、经济、语言、宗教信仰的概述性文章以及《互助土族自治县东沟大庄地区社会历史调查》、《互助土族自治县红崖子沟地区土族社会历史调查》等调查报告。根据这些调查,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分别出版了《土族简史简志合编》、《土族语简志》、《土族简史》一系列丛书。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所限,对土族文化的调查难免失于粗犷和平铺直叙。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族学学科发展缓慢,土族研究相对滞后。进入80年代之后,土族研究出现了新的进展,涌现出一批研究学者,如潘乃谷、李克郁、高丙中、马光星、吕建福、秦永章、胡廷、何吉芳、鄂崇荣、杨卫、范玉梅、文忠祥等。其中潘乃谷的《土族婚姻家庭的变迁》(约4万字)一文主要讨论了土族婚姻制度、婚姻方式、婚姻范围、家庭类型、家庭规模等几方面的变化和发展。高丙中的《文化影响与文化重构——土族的例子》、《土族生活方式的转变:青海五十村和鲍家村的例子》、《现代化与时空观念及其设置的转型》等文章,均以土族为例探讨了民族之间文化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以及时空观念的转型。李克郁等主编的《土族婚

^① 祁进玉:《土族研究一百年》,载《西北民族研究》,2005(4)。

丧文化》一书对土族的婚姻习俗、丧葬习俗以及家庭关系作了较系统的阐述。《土族：青海互助县大庄村调查》一书以互助县一个土族村庄为个案，主要进行了民族志的记录和描述。文忠祥的博士论文《土族民间信仰研究》对土族民间信仰的变迁做出全面深入的探讨。但是，相对成果丰硕的土族历史、土司制度、族源、民俗、语言的研究来说，土族民族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系统研究土族文化传承与变迁的专著依然阙如。本书试图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土族文化作系统的探讨，填补以往的空白。

笔者最初在文献资料中接触土族之时，就对其分布格局和文化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在最早对土族分布有详细描述の《秦边纪略》（成书于康熙三十年，即1691年）中，提到土族的分布区包括：西宁^①、庄浪^②、河州^③、洮州^④、岷州^⑤、临洮^⑥等地。而据三百余年之后的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土族主要聚居在青海省的互助县、民和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大通县）、乐都县、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甘肃省的天祝藏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天祝县）等地，其他散居人数较多的有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都兰、贵德、共和等县、海北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海北州）、门源回族自治县（以下简称门源县）、乌兰等县、西宁市以及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以下简称临夏州）、永登县和肃南等地，其余的散居在青海省、甘肃省以及全国各地。

就生存空间来看，土族的分布范围虽然有所扩散，从聚居到西北地区发展为逐渐向东南部扩散，但其世代生息繁衍的地区依然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和祁连山东南麓以及黄河、湟水、大通河流域。就生活环境来看，土族生存的区域正好是汉族、藏族、回族等民族文化的边缘和缓冲地带，民族迁徙较多，交往互动频繁。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在汉族文化、藏族文化、回族文化等主流文化和强势文化的包围之中，土族顽强地保留了本民族的固有特征和文化特质，并没有为强势文化民族

① 明朝设西宁卫，雍正年间改西宁卫为西宁府，包括今青海省西宁市、乐都县、民和县、互助县、大通县和门源县。

② 相当于今永登县。

③ 包括今甘肃省临夏州，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同仁县、贵德县。

④ 今卓尼县和临潭县。

⑤ 今宕昌县。

⑥ 清朝初年为临洮府，府治狄道。乾隆五年迁府治于兰州，升为狄道州。即今临洮县。

所同化,正如许让神父所说,“土人的风俗虽极受它(他)邻居汉人和近亲西藏人的影响,但还保持着它(他)的原形。它(他)们还可以表示许多古代社会组织和游牧生活的秘密”^①;同时又吸收和借用了汉族、藏族等民族的文化成分,重新构建和塑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土族文化是一种典型的连接地带文化,文化碰撞和融合成为贯穿土族民族发展过程的一条主线。在现代化的冲击波中,土族与他族文化的碰撞加剧,土族人在这种情境的现实之下如何思考和行为,土族文化未来将走向何方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等民族也是世居甘肃和青海民族文化交接地带的民族。同这些民族相比,土族和其他民族文化的碰撞和整合更具特色。虽然土族的分布相对这些民族来说比较分散,但却形成了块状分布格局以及相应的方言区。青海省互助县、民和县、大通县、同仁县等地是土族人口超过3万以上的县,互助县和甘肃省天祝县地域相连,民和县和甘肃省临夏州隔黄河相望。土族语有互助、民和、同仁三大方言区,其中青海大通、乐都、互助和甘肃省天祝等地的土族语属于互助方言,青海民和及甘肃积石山等地的土族语属于民和方言区,青海同仁县的“五屯”土族语属于同仁方言。而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甘南州)卓尼县也有少量土族分布。他们聚居于勺哇乡,俗称“勺哇土族”,由于周围藏族的影响,已经完全使用当地藏语方言。土族语的不同方言区虽然同属土族文化区,但却具有不同的区域特色。由于精力所限,本书所探讨的对象主要限于互助方言区和民和方言区。分布在互助方言区的土族生存的空间属于华锐藏区^②,受藏族文化影响较大,无论在生活习俗、语言、还是宗教信仰上都熏陶了藏文化的特色;而分布在民和方言区的土族则受周围回族、汉族的影响较大,在语言、习俗、宗教信仰、行为方式等方面受汉文化影响较为深远。同属一个民族,分居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化发展也出现了一定的分野,虽然不能说形成了亚文化区,但的确在原有基础上发生了变迁,而且变迁的方向和内容不尽相同。可见,土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鲜明的区域文化特色。这种文化特色和变迁特点,

① [比]许让神父:《甘肃土人的婚姻》,导言,2页,费孝通、王同惠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② 华锐,意思是英雄的地区或部落,属于安多藏区,历史上指湟水以北、河西走廊东端南部,相当于今天青海的乐都北山、互助、门源、大通东部,甘肃的天祝、肃南皇城等地区。

是东乡、保安、撒拉等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所不具备的。

研究土族文化变迁，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而今，新农村建设运动在国家计划中越来越重要，农村的现代化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而文化的现代化更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走向的重大问题。对西北少数民族文化进程的科学认识和深入研究，是推进西北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基礎。这类研究不仅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而且可以实际运用到治理农村的实务中去。只有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发展特点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够顺利地和其进行对话，同时也有助于预防各种可能出现的误会和冲突。

二、对相关概念的界定和说明

操作化的定义在课题的研究设计细节中是必不可少的。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首先需要尽量明确所要发现的东西，然后才能采取最好的方法进行研究。本书涉及的概念众多，而最为关键的有文化、文化传承、文化变迁等概念。首先，文化应当被理解作为一种有方向性的过程。在文化的进程中，传承与变迁是并列的两种方式：文化传承意味着传统的延续，文化变迁意味着传统的嬗变。两者互相关联，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文化是本书最基本的概念。不同学科对文化的界定各有视角，似乎文化是多义而模糊的，有时泛化到被滥用的程度。而不同的文化人类学派对文化的界定也有所不同。英国人类学家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所掌握和习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① 他的这个界定虽然是民族学和人类学者奉为圭臬的经典定义，但是在对文化进行研究的实际操作中，许多学者并不是像他一般把文化的内容罗列出来，而是把它纳入各种不同的理论当中加以讨论。另外，和泰勒一样不强调物质文化的重要性，认为文化是从物质中分离出来的事物的观点很少。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物质设备、精神方面之文化、语言和社会组织，它们构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每一方面都在文化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① [英]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1页，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美国心理人类学派的玛格丽特·米德认为文化是代代相传的有系统的习俗行为的总体，而本尼迪克特则把文化视为“人格的典章性扩大”。李亦园先生把文化分为可观察的文化和不可观察的文化两部分，其中可观察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或技术文化）、社群文化（或伦理文化）、精神文化（或表达文化），不可观察的文化指文化文法。^① 笔者在本书中对文化的界定采用克拉克·威斯勒的定义：“文化是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的基本现象就是个体活动的总和所形成的生活范围。”^② 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中，“生活方式”一般作为阶级、阶层或群体差异的附属性概念来使用，后来又当被当作消费方式的同义词。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生活方式研究的著作和论文主要有高丙中的《现代化与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西方生活方式研究的理论发展叙略》，王雅林的《中外城市生活方式比较》，黄平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马姝、夏建中的《西方生活方式研究理论综述》等。笔者以为，生活方式涵盖了人类社会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是包括经济生活方式、礼仪生活方式、宗教生活方式、娱乐方式在内的人类社会生活领域的综合体。其中，经济生活方式基本相当于衣、食、住、行等物质文化；礼仪生活方式，包括人生仪礼、接人待物方式等；宗教生活方式，包括日常的宗教生活以及崇拜和祭祀；娱乐方式包括节庆、庙会和民间游戏等。对于土族这样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来说，家庭既是生活方式的一个方面，也是传承文化的重要场域；语言既是生活方式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同时又扮演着传承文化的载体角色。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笔者把家庭作为单独一章，探讨了其边界意识、家庭结构以及家庭关系；把土族语言作为单独一章对其语言使用、语言态度和语言认同作了一些探讨。我们说土族具有自己的文化，是因为从许多角度来观察土族的日常生活，都可以发现和其他民族群体不同的一些实践活动。比如，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是内部通行的不为外人所理解的语言。他们所建造的房屋、穿着的服饰、制作的食物等等物质设备，和其他的民族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有的现象甚至令其他民族感到惊奇和不可思议。同时，他们的婚姻、宗教、家庭生活以及关于道德标准、死亡现象、世界运行的解释，都和其他民族截然不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存在着一种土族文化，它属于主要居住在青海和甘肃高原地区的我们称

① 李亦园：《李亦园自选集》，11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② [美] 克拉克·威斯勒：《人与文化》，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之为土族的那个群体。土族文化是包括了这个民族全部生活范围的巨大综合体。要全面记录这样一种文化，必须详细记载他们的生计、饮食、服饰、居住等物质文化现象以及语言、婚姻、家庭、娱乐、宗教信仰等全面而丰富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民间文学和艺术是娱乐生活方式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但是由于笔者能力所限，仅在文中引用少量文学、艺术方面的资料，并未设专门的章节对其进行论述。

本书涉及的第二个重要概念是文化传承（transition）。传承是文化的一种固有特性。传承意味着某种世代相传的东西，即任何从过去延续至今或相传至今的东西。民族文化的再生产在一定时期内显得像是一成不变的复制，这就是文化的传承。传承的对象可以包括所有的物质制品、信仰和思维模式、社会关系模式、技术惯例以及人类创造的其他成就。传承的结果就是传统的延续和积淀。在主要以传承作为文化进程的传统社会中（又称作前资本主义社会、前工业社会等），社会的一致性是以机械团结和集体良知也就是共同的信仰、态度、礼仪体系等为基础的。在土族社会中，文化传承表现于各个方面，而最具特色、在土族社区中时刻彰显的就是土族语言的相对稳定性。

第三个概念是文化变迁。文化变迁一般指由本文化内部的发展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而引起的文化的改变。^①文化变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变迁包括文化领域发生的任何循序渐进的小型的变化，而狭义的文化变迁仅指在文化结构方面发生的根本性的质的变化，这些变化将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结构乃至技术体系。本书的文化变迁指的是广义的文化变迁，既包括横向的由于生存环境不同产生的变迁，也包括纵向的随时代变化而发生的变迁；既包括文化结构方面的质变，也包括文化领域中微小的量变。

文化变迁是文化的一种绝对存在状态。在民族间的交流和互动日益频繁的现代社会，形态各异的文化以更加错综复杂的方式呈现在土族人面前，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们的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土族的生活方式经过时间的打磨，与形成时期的面貌相比有所改变，吸收了周围文明的许多特质。今天看来，土族文化的内容相对丰富而多样化，这种结果就是建立在文化吸收基础上的文化变迁导致的。“文化通过再生产而呈现为复制与重构、因袭与维新的两种极端状态以及介于它们之间的多种中

① 麻国庆：《走进他者的世界》，302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